這一天，他／她們說自己的故事

2018 年原住民族日活動側寫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原住民族坎坷的際遇，從其稱謂生番、熟番、理蕃、山胞……主流優勢群體在不同時代都有歧視的眼光、法律規範，要去除汙名標籤，除了強化原住民「自己說」的主體論述外，整體社會的傾聽與思索或許是更大的挑戰。

農曆新年、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多數臺灣人對於這些節日的來由與緣起，或許都有著相當程度的了解；但如果被問到：「8 月 1 日」是什麼日子，你回答得出來嗎？而如果被告知：這一天，是所謂的「原住民族日」，你明白這個日子的意義嗎？

緣起

回顧歷史，一群臺灣最早的住民曾被歷代統治者賦予不同稱謂，更被視為國家法外的特殊人群。清領時期，他們是「番」，其中服政府之教化者稱為「熟番」，未服教化者稱為「生番」；日治時期，變成了「蕃」或「高砂」，在國法上不具法律人格，不須依法統治，在理蕃行政體制下，為法制上的特殊國民；戰後，則又成為（其實並不一定聚居於山上的）「山胞」、「山地人」。潛藏在這些稱謂背後的，是統治者給予的污名標籤和主流優勢群體強烈的歧視眼光。1984 年，由原住民知識青年組成的抗爭團體「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從此展開長達十餘年的「正名運動」，要求臺灣社會接受原住民族才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並於 1987 年發布「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宣示其地位與權利。

1994 年 8 月 1 日，在社會各界的強烈要求與期待之下，政府終於將沿用多年的「山胞」正名為「原住民」，並於 1997 年第四次修憲時確立其「民族」屬性，賦予「集體權」概念的「原住民族」稱謂，以突顯原住民族是臺灣「原來的主人」的地位。為了紀念這段原住民族自我認同及抗爭的歷史，行政院在 2005 年通過將 8 月 1 日訂定

為「原住民族日」，希望透過多方對話，讓全民正視並真誠反省原住民族長久以來所歷經的掠奪、迫害、打壓和歧視；同時也銘記其「自我決定」所展現的自尊追求、爭取自治及土地等固有權利的主體意識彰顯。

以此脈絡為背景，臺文館不僅在今年五月推出「原來如此：原住民族文學轉型正義特展」，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文學之外，以寬泛而多元的角度讓更多人認識乃至反思從過去的歷史到當前的社會，原住民族爭取自我認同、追求文化復振的心路歷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和挑戰。於是，便有了 2018 年原住民族日「『原』來的聲音——『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聆聽與思索」講座活動。

誰轉了誰的正義？——從消失的 100 萬公頃談起

為了避免流於空洞的口號文宣或政治語彙，這場講座所邀請的講者，均為長期且實際參與原住民族平權運動、或從事原住民影像紀錄與拍攝、藝術創作的文化工作者，他／她們來自不同族群、世代、性別，所關注的議題更是跨越多元領域和不同媒材，因而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引領聽眾深入原住民族歷史和文化境遇，反思當代社會如何翻轉困境，實踐多元族群文化平權的理想願景。

上午首先登場的是紀錄片導演、臺南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前主委、目前更重要的身分是「原轉小教室」發起人馬躍・比吼（MayawBiho），以「誰轉了誰的正義？——從消失的 100 萬公頃談起」為題所進行的專題演講。2017 年 2 月 23 日，馬躍與原住民歌手巴奈、那布等人在凱達格蘭大道前，拉開布條，抗議「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違反《原住民族基本法》，認為這個辦法將導致原住民土地被財團大量開發，阻礙原住民文化發展，也傷害生態環境；他們的訴求是修改「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

馬躍・比吼講述土地劃設辦法缺失情形。

講座會後合影(第一排右起)南市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汪志敏主委、臺文館蕭淑貞代理館長、谷暮・哈就市議員助理、馬躍・比吼導演、臺文館趙慶華助理研究員。

圍土地劃設辦法」，同時要求沒有為原住民族守住最後陣線的原民會主委下台。

這場漫長的抗爭至今仍未結束，歷經無數次安寨紮營與撤除驅離的輪迴交替，戰場從凱達格蘭大道轉移到臺北捷運臺大醫院站 1 號出口，儘管參與和關注的人數漸漸減少，他們仍始終堅持「傳統領域不打折」，一方面向來往民眾耐心解說他們的訴求，創辦「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小教室」，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分享原住民文化和土地的智慧與知識，另一方面則是以分進合擊的方式——「巴奈海嘯巡迴 100 場」演唱會、馬躍受邀至各地演講……，就像辛勤的園丁在荒蕪的土地播撒希望的種子，他們深知，文化傳統的復振與主體意識的建構無法一蹴可幾，漫長的歷史進程需要有人持續耕耘灌溉。

而這或許也正是馬躍在演講現場看到眾多年輕學子特別感動的原因。這位長期與公部門站在對立面的「（街頭）運動家」回到曾經旅居的臺南，神情和語態都顯得溫柔了起來——雖然他笑稱因為在街頭很少見到這麼大的場面、這麼多的人而不免有點緊張。由於臺南與凱道距離遙遠，因此他帶來大量的抗爭現場影像與聽眾分享，也詳細說明行政院版本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未將大約 100 萬公頃的「私有地」納入，將如何導致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破洞化、臺灣生態環境的破壞，希望能讓在場的聽眾理解，為何原住民們無法接受這樣的辦法。除了深入淺出的解說、以及豐富的影像和數據資料，他同時也提到自身參與抗爭運動的心路歷程，特別是因為沒有討好執政者而相繼得罪「藍、綠」朋友、直到現在關係仍難以修補的種種。說到這裡，憤青語帶哽咽、難忍激動地流下男兒淚，最終仍不忘期勉這個島嶼上要努力的事情何其多，只要每個人多做一點、多講一點點、多寫一點，便能撐出改變與進步的空間，這是所有人的功課，因為，「沒有人是局外人」。

Palalaut[1] 說 ・ 我的名——原住民影像創作的跨世代對談

在充滿原汁原味的原民風味餐之後，下午的場次則是由監察院孫大川副院長主持的「palalaut 說 ・ 我的名——原住民影像創作的跨世代對談」座談會，與談者包括以攝影關注臺灣與社會運動的潘小俠，投入文化復振的紀錄片導演、臺中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 ・ 亞布，以及影像與多媒材藝術家張恩滿。

1. 排灣族語，永遠。

左｜攝影家潘小俠(右四)帶來原民影像作品，右起臺文館蕭淑貞代理館長、藝術家張恩滿、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臺中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亞布。
右｜講台上的原住民影像創作的跨世代對談。

主持人以一幅歷史輪廓為開場：原住民族在臺灣少說也有三、五千年的歷史，但在歷史上卻很難聽到原住民自己說話的聲音，這個現象直到 1980、1990 年代之後，才慢慢發生變化，除了作家們以寫作「用筆來唱歌」、音樂人用母語古調演繹族群的故事，更有影像工作者透過鏡頭下的觀景窗記錄當下或追尋過往的文化樣貌……，在在皆充分反映這個民族試圖尋找合用的工具，捕捉即將消失的記憶的強烈企圖心，讓我們對於原住民的文化與形象多了一點認知。而他也對在場的「漢人朋友」提問：對原住民的認識有多少？有沒有參加過原住民的祭典？是否知道各族群所在的位置？原住民傳統音樂有些什麼樣的特質？——確實，以「漢人」為主的臺灣社會至今對原住民精神世界和文化內涵的認識，以及其在臺灣發展的狀況和感受，接觸的少、認知也很不足，大多是道聽塗說的「刻板印象」，而這正是最應該被「轉型」的部分。

從這樣的提點出發，接下來便是與談者們的自述與分享。攝影家潘小俠具有琪哩岸平埔族身分，曾於自立報系擔任記者，很早便展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影像記錄；1980 年代則因一趟蘭嶼之行與原住民文化結緣，起先是大量拍攝蘭嶼原住民影像，後來更擴及都市各角落的原住民。此次分享，他將過去在部落、在街頭留下的原住民影像呈現給聽眾，同時也帶來以日治時期原住民高砂義勇隊為主題的紀錄片《不知為誰而戰》的珍貴畫面。

在場的唯一女性張恩滿，人稱「滿姐」，目前就讀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藝術家與資深策展人，曾參加多項國內外重要藝術特展。雖然兼有排灣族與外省第二代的身分，但也自承因為從小成長、生活在臺北，所以曾有一段時間「不太清楚原住民是怎麼一回事」，直到莫拉克風災，才突然特別想回到出生之所、四歲便離開的地方——母親的故鄉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這個心願直到 2010 年才完成，由此真正進入原住民的天地，從而影響其創作——2010 年至今，所有創作都與原住民相關，特別關注當下發生的現實事件與議題。她以「輕薄之力」為自己的影像作品下註腳，向觀眾引介《競技場》、《台九線蝸牛料理訪談計畫》、《台灣原住民獵槍除罪化》等五件作品，從創作方式、談論角度、影像背後等面向，追索如何透過藝術擾動部分體制，視創作為一種行動，與難以察覺的幽靈進行對抗，也為生命經驗和成長過程留下印記。

三位與談人中的「中生代」比令・亞布（Pilin Yapu），從事原住民影像記錄拍攝大約已有將近 15 年的時間。20 多年前與同為泰雅族的作家瓦歷斯・諾幹任職同一所學校，兩人以文學論交結識，比令說自己曾同樣懷抱文學大夢，然而後來文學夢未成，卻在因緣際會之下接觸了攝影機，便開始記錄自己的部落，從此成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最早拍攝的是泰雅族的祖靈祭，在祭典傳統搖搖欲墜的當下，他持續記錄了七、八年，而後巡迴各部落放映超過 200 場，讓部落有了很大的改變，最重要的便是祭典得以保留、恢復其原有的風貌。而除了紀錄片導演之外，比令的另外一個頭銜是「臺中博屋瑪國小校長」，這所位於臺中市和平區達觀里大安溪畔的小學，成立於 1949 年，原名「達觀國小」，在比令和眾多致力於深耕原住民文化教育的老師們齊心協力下，不僅讓小學生以投票的方式為學校「自我命名」，更精心安排真正多元且能達到有機連結的民族文化教育，從課綱與課程的設計、地理生態環境資源妥善運用、各科目之間的相輔相成……，其辦學之成功，遠近馳名，就連許多不具原住民身分的家長都想把孩子送到這裡讀書。這不但是原住民建構並還原其主體認同、主場優勢的最佳典範，或許也可以讓我們好好思索：將原住民族在地知識與傳統文化實踐於學校教育、結合於日常生活，其實或許並沒有那麼難。